

## 《古今圖書集成·經籍典·禮記部》 的文獻價值

劉千惠\*

### 一、前言

類書是我國古代典籍中特別的一種文獻類別，其輯錄各門各類的文獻資料，按照一定的方法編排，進而便於人們檢索利用，為典型的工具書。類書本是古代士人利用文獻及檢索便利而產生的，但隨著歷史的發展，使其衍生出另外的功能——輯錄古佚書及校勘古籍，因此類書的文獻價值更加受人重視。

《古今圖書集成》是現存最大的類書，於康熙四十年(1701)十月由陳夢雷開始編纂初稿<sup>1</sup>，至康熙四十五年(1706)四月初稿完成<sup>2</sup>。康熙六十一年(1722)十一月，康熙去世，雍正即位，於十二月十二日便下諭流放陳夢雷，並於雍正元年(1723)正月，下諭蔣廷錫續編《古今圖書集成》，於雍正四年(1726)排成銅活字本，共印六十四部。

《古今圖書集成》分為正文一萬卷，目錄四十卷。本書共分為〈曆象彙編〉、〈方輿彙編〉、〈明倫彙編〉、〈博物彙編〉、〈理學彙編〉、〈經濟彙編〉六彙。於彙編之下又分為三十二典，典下又分部，共計六千一百零九部。在〈理學彙

---

\* 劉千惠，東吳大學中文系碩士生。

<sup>1</sup> 此時陳夢雷所編著名為《文獻彙編》，一直到康熙五十五年(1716)才呈進，康熙賜名《古今圖書集成》，開館進一步加工。見裴芹著：〈《古今圖書集成》與清代編書之風〉，《古今圖書集成研究》（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2001年），頁20-21。

<sup>2</sup> 據〔清〕陳夢雷《松鶴山房文集·進彙編啟》所言：「謹于康熙四十年十月為始，頒銀僱人繕寫。……至此四十五年四月，內書得告成。」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第1416冊，卷2，頁38。

編)下分為〈經籍〉、〈學行〉、〈文學〉、〈字學〉四典；〈經籍典〉下分有六十六部，本文主要即探討其下〈禮記部〉的文獻價值。

古代類書至《古今圖書集成》後已漸漸式微，其後沒有再產生似此的巨型綜合性類書，加以其文獻彙編及檢索的功用漸被現代工具書所取代，因此研究者較少，多為概述性的介紹，專門研究者只有裴芹《古今圖書集成研究》一書，但對於本書的文獻價值卻未有深入研究。然在本書之〈經籍典〉中，實存在彙編古代經籍資料及索引的功能，故筆者擬先介紹本書〈禮記部〉一類的體例，再就其所具備的文獻價值及存在的缺失兩大方面加以探討，以使吾輩對《古今圖書集成》所具備的文獻資料價值更加了解。

## 二、〈禮記部〉之體例

《古今圖書集成》共分為十個緯目，分別為：彙考、總論、圖、表、列傳、藝文、選句、紀事、雜錄、外編等十類。對於此十類的選錄標準，《古今圖書集成》於〈凡例〉中有明確之說明<sup>3</sup>。

「彙考」所收錄之資料主要可分為二種，一是「大事，有年月可紀者，用編年之體，倣《綱目》，立書法于前，而以：按某書、某史詳錄于後」。另一則是「與一事一物無關政典者，則列經史于前，而以子集參互于後」。主要看來，「彙考」乃是收錄某一事類發展演變的資料。「總論」則是以「聖經中單詞片句，併註疏皆錄于前，蓋立論要以聖經賢傳為主也」。也就是收錄歷代評論某一事類的資料。「圖」則是收錄某一事類相關之圖像，此乃是因「往籍所有，亦可存以備覽觀。或一物而諸家之圖所傳互異，亦並列之，以備參考」。「表」之一類所立，乃是因「唯星躔、宮度、紀元等，非表不能詳者，則皆立表」。「藝文」則是收錄有關某一事類的文學作品，且「篇多則擇其精篇，少則瑕瑜皆所不棄，大抵隋唐以前從詳，宋以後從略」。「選句」則是選錄某一事類之麗詞偶句。「紀事」則收錄難以入「彙考」中，但又有可傳之價值的瑣細資料，且「按時代列正史于前，而一代之稗史子集附之」。「雜錄」則是收錄非專論某一事類，但旁引曲喻偶及之者，其難

<sup>3</sup> 參見陳夢雷等編：〈目錄〉，《古今圖書集成》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5年），第1冊，頁13-21。

入「彙考」、「雜錄」、「總論」或「藝文」中，故收在此一緯目中。「外編」則是收錄「有荒唐難信，及寄寓譬託之辭、臆造之說」一類的資料，因恐棄之而又疑為掛漏所以收錄之。

由以上介紹可知，《古今圖書集成》的緯目編排細密，其主要的目的乃是為了「既要盡可能收錄文獻的齊全，又不是一律看待，而是兼顧兩個方面，以使所編之書保有最充分的檢索徵引功能」<sup>4</sup>。就因《古今圖書集成》最初編纂的目的是為了提供學子檢索方便之用，故在體例上自當有嚴謹的規劃，才容易使人查檢便利，也因此其緯目的分類編排，足以見其此方面的用心。吾人於利用《古今圖書集成》時，正受用於此緯目之編排，如在〈禮記部〉一類中，倘若只要查找關於《禮記》相關的藝文資料，只須翻查「藝文」之緯目，不必查檢其他項緯目；倘若欲查找《禮記》一書在歷代的文獻方面之記載，則當以「彙考」一類為主，故在檢索利用時相當方便快捷。

〈禮記部〉一類，在《古今圖書集成》中共分為「彙考」、「總論」、「藝文」、「紀事」、「雜錄」五類。「彙考」資料自周代起，贊成孔子始作《禮記》一書，且至漢代續有增補。其類又分為八：「彙考一」收集周至明代關於《禮記》之文獻記載；「彙考二」收集漢代至宋代注解《禮記》及相關篇章著作的序言或跋記；「彙考三」為宋代至明代注解《禮記》及相關篇章著作的序言或跋記；「彙考四」為明代注解《禮記》及相關篇章著作的序言或跋記；「彙考五」則是歷代官修書志及私人圖書目錄中，載及《禮記》相關著作之書目。共有《漢書·藝文志》、《隋書·經籍志》、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、《宋史·藝文志》、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、鄭樵《通志》、王應麟《漢藝文志考證》、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、王圻《續文獻通考》、焦竑《國史經籍志》等書志。「彙考六、七、八」為朱彝尊《經義考》一書中，著錄《禮記》類之書目。

「總論」分為四，收錄歷代評論《禮記》的資料，其標準為「必擇其純正可行者」，且「以聖經賢傳為主」，倘若子部及集部有談及此事者，則「必擇其議論之當者」<sup>5</sup>。「總論一」收錄班固《白虎通德論》、王充《論衡》、蔡邕《獨斷》、顏之推《顏氏家訓》。「總論二」收錄朱熹《文集》及《語類》中，評論《禮記》

<sup>4</sup> 見裴芹著：〈談《古今圖書集成》的結構體例〉，《古今圖書集成研究》，頁55。

<sup>5</sup> 〈目錄〉，《古今圖書集成》，第1冊，頁14。

之文章和言論。「總論三」收錄劉敞《七經小傳》、鄭樵《六經奧論》、呂祖謙《呂東萊先生文集·禮記說》、葉夢得《禮記解》。「總論四」收錄王應麟《漢制考》、何異孫《十一經問對》、方孝孺之文集、韓邦奇《苑落集·見聞考隨錄》、袁黃《群書備考》、顧炎武《日知錄》。

「藝文」分為三，一類收錄關於《禮記》重要之文章，另一類收錄有關《禮記》之賦、文、詩等文學作品。

「紀事」分為二，收錄撰作《禮記》及其注解之經學家傳記，多從歷代史志及地方志中摘錄，對於了解經學家之生平相關資料極其有益。「雜錄」分為二，收錄專論或非專論《禮記》，旁引曲喻偶爾相及的零碎資料，為「彙考」一類的補充。

### 三、文獻之價值

《古今圖書集成》設部皆有其一定標準，一個部即是一類事物或是一種文獻資料的彙集。關於分類的標準，其於〈凡例〉中即有明確的說明，並可從中了解《古今圖書集成》的結構體例。其言於〈理學彙編〉下立〈經籍典〉，乃是因為「理莫備于六經，故首尊經籍」<sup>6</sup>。又〈經籍典〉之選錄範圍及排列順序其言：

〈經籍典〉，經籍所以垂教萬世，凡事關帝王尊經者，皆按代編年，詳其本末。至諸經傳註，先儒授受各有源流，雖歲月無可稽而時代有先後，皆倣編年之體，立綱于前，述其授受源流，凡以尊經也。若諸子百家紀述，則區其種類，紀其事蹟，兼集諸家評駁之語而已。<sup>7</sup>

由此可知，〈經籍典〉大致是按年編排，有時則以類相從，以明其事類。其選錄的書籍，則是以可垂教後世的經典為主，故《十三經》自然包括於其中，並各自獨立成部。

〈經籍典〉受到宋明以來理學家的影響，將《大學》和《中庸》從《禮記》中抽出，獨立成部。又將書名為《四書》類者劃分出去，獨立成〈四書部〉一類；除〈四書部〉一類外，再細分為〈論語部〉、〈大學部〉、〈中庸部〉、〈孟子部〉四類，分類頗為細密。除此之外，其將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、《禮記》分別獨立成

<sup>6</sup> 同前註。

<sup>7</sup> 同前註，頁 19。

部，並將通論《三禮》者另分為〈三禮部〉一類。本文於探討〈經籍典〉的文獻價值時，將以〈禮記部〉為例。

關於〈經籍典〉中所具有的文獻資料之價值，以下即以〈禮記部〉為例，分為數點討論。

### （一）文獻資料之彙集

類書的最大功用即是在短時間之內能夠掌握某類事物的多數資料，關於此點，《古今圖書集成》因彙集大量古書資料，故在短時間內，對於掌握某類事物的文獻資料上，有相當大的貢獻。

以〈禮記部〉為例，倘若學者欲對《禮記》一書及其相關研究著作有所了解，《古今圖書集成》即提供此類服務。在「彙考一」中，編者將歷代關於《禮記》相關之文獻資料彙集，使得後人於利用時，可以快速掌握關於《禮記》之重要事件的記載。

在「彙考一」中，其按時代順序，從周代至明代，將歷代記載關於《禮記》相關事件錄出，第一條資料為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的記載，言周敬王之時，孔子遊歷列國十四年返回魯國，因禮樂廢，欲追三代之跡而始作《禮記》。在其下之按語並言：「哀公六年，敬王三十一年也。」說明《史記》中所稱之魯哀公六年為周敬王三十一年，使參閱者能與周代紀年相對照。由此則記載可以明白，編者贊成《禮記》一書由孔子時開始撰作，其後再加上孔穎達於《禮記正義》中之按語，以為孔子歿後，由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成《禮記》一書。其中並摘錄《禮記正義》中談論各篇作者之問題，如〈中庸〉為子思所作；〈緇衣〉為公孫尼子所撰；〈月令〉乃呂不韋所修等。此可稍使利用者明白《禮記》一書中，各篇所存在的作者問題，並提示可能的答案。在漢代資料的彙集上，加上史書中的記載，談論《禮記》至漢代時之增補情形，表達出編者以為《禮記》至漢代時有所增入的情形，其中並列出各篇增入之時代及撰作者。姑且不言其彙集資料的正確性，但仍可使利用者在短期內能迅速掌握《禮記》一書所存在的各篇作者問題，並了解有人以為《禮記》某些篇章為漢人之著作，非成於戰國時代。

除了能夠迅速彙集《禮記》一書在歷代的重要記載，更可從彙集的資料中，明白《禮記》地位的升降。原本「六經」中所稱的「禮經」主要是指《儀禮》，又稱為《士禮》。西漢時置於學官者，也是《儀禮》。自先秦迄西漢，傳習《儀禮》的

學者都附有一些解說《儀禮》或其他禮儀的參考資料，此即稱為「記」，也就是對經文的解釋、說明和補充。大約到了戴德、戴聖時，他們對當時流行的「記」，進行編輯修訂的工作，形成現在見到的《大戴禮記》和《小戴禮記》，從此「記」有了固定的本子。到了東漢時代，鄭玄為《禮記》作注，使得《禮記》得以擺脫從屬於《儀禮》的地位，並逐漸受到士子的尊崇和傳習。至唐代，國家開科取士中的明經一科，其專考的九經中，即包含有《禮記》一書，且孔穎達所修《五經正義》中，《禮記》即取代其他二禮，地位大幅提升。宋代時雖廢除明經一科，然而《禮記》仍與《周禮》、《詩經》、《左傳》並列為大經。明代以後，《禮記》的經學地位更進一步提高，其所列的「五經」中，《禮記》即取代了《儀禮》一書。

由「彙考」中可以發現，《禮記》自漢宣帝時，即立於學官；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，更可見皇帝命人講解《禮記》一書；宋代時，更可見賜進士《禮記》相關篇章，以勵士檢。由「彙考」中所彙集歷代的記載可知，《禮記》一書始終受到歷代的重視。

《古今圖書集成》除了大量運用歷代史書之外，對於類書、文集、地方志等皆有所引用，使得資料之彙集更形完整。如在「彙考一」中，其言「皇祐五年四月，楊安國等上《禮記節解》九十卷」一事，即未見於《宋史·仁宗本紀》，但其引用《玉海》的資料加以補充，使人了解宋仁宗時，詔楊安國等以「五經正義節解」為書，詔以《五經精義》為名，至皇祐五年(1053)時，上《禮記節解》九十卷一事。

又如其於「紀事」一類中，彙集歷代經學家之傳記資料，使利用者於短期之內能夠迅速地掌握關於某人之生平紀錄，且其所引資料不只包含歷代史書，更大量徵引地方史志，使傳記資料更形完整詳確。如方慤，其人史傳中多有不載，然「紀事二」中徵引《浙江通志》之記載，使吾人稍對方慤有些許認識，知其字性夫，桐廬人。且曾中進士，仕至禮部侍郎等職。馬晞孟其人，「紀事二」中徵引《江西通志》資料，知其為廬陵人，熙寧癸丑(1073)時登第。

其於「紀事」中常徵引眾多方志資料，其中所引之方志可能為現今所不見者。如「紀事二」中徵引《都昌縣志》中陳澐之傳記資料，但查閱現今所存之《都昌縣志》，並無相同之記載。現存之《都昌縣志》有兩部，一為清康熙年間魯王孫等修，徐孟深等纂之《都昌縣志》；另一為同治年時由狄學耕等修，黃昌蕃等纂的《都昌縣志》。後一部不可能為編定《古今圖書集成》時所見，但查閱徐孟深所纂之《都昌縣志》也與《古今圖書集成》中所見陳澐之傳記資料不同。且於《古今圖



書集成》中言陳澧的《禮記集說》為三十卷，可知其應為明代編纂《禮記集說大全》後所纂修之《都昌縣志》<sup>8</sup>。今未可見此《都昌縣志》，但由於《古今圖書集成》之徵引，使得後人藉以參考利用。

由〈禮記部〉的彙編資料可知，其對於《禮記》一書的資料蒐羅廣富，以便於使士子利用索引，後人於研究《禮記》一書時，可由此於短時間內查找到清代以前的資料彙編，此乃類書最大的功用。至於《古今圖書集成》引文的詳略性，則留待下面「錄文之未完備」一節再加以討論。

## （二）按、注之文獻價值

類書的編者對某些問題、資料、編排的說明和解釋，通常會於某條文獻之後加上注語說明，此即為按、注。按、注的出現，最遲在隋代的《北堂書鈔》中已經出現，宋代的《冊府元龜》、《事文類聚》，明代的《永樂大典》等著名類書中，都有不同程度的運用。在《古今圖書集成》一書中，按、注也成為其書的一大特色之一，裴芹即言：「《古今圖書集成》的按注則以其數量巨大、內容廣泛、功用多、初步形成體系為特色，顯示了按注在類書編纂中不可缺少的作用。」<sup>9</sup>

《古今圖書集成》的按、注究竟有多少，目前尚未有人有完整的統計數字，且其分部不平均，有些典中出現較多，有些典則少見按、注。在文字長短方面，有些按、注多則二、三百字，有些則短至二、三字。以按、注出現的位置來看，有些在類部名、緯目名之下的，有些在一部首條資料之末，有在條目末尾，有在條目文字中間者，另有一種少見之情況，乃是位於末條之下的按、注與在同一部首條的按、注，兩者前後呼應。按、注內容的涵蓋範圍，有涉及多個部的，有關係一部整體的，有只關係一部內幾個緯目的，或只關係一個緯目者，更多的是只關係一個條目或一個條目內的字句者。

關於按、注的內容，裴芹大體將其分為：說明立部分類、說明參見互見、說明體例變通、說明文字段落的調整與刪節、校勘、說明引文的版本、補充與注釋、說

<sup>8</sup> 陳澧《禮記集說》原為十六卷本，後經賈坊所併才成十卷本，且後人誤將《禮記集說大全》之三十卷與《禮記集說》相混，致使出現三十卷本，實則只是篇目分合有別，故三十卷本乃明時才出現之版本。此說可參考清代陳鱣《經籍跋文》之考證。

<sup>9</sup> 見裴芹著：〈《古今圖書集成》的按注研究〉，《古今圖書集成研究》，頁 64。

明一些條目的收錄理由等八大項<sup>10</sup>。也因為《古今圖書集成》的按、注具有以上各項功用，使得其文獻的價值得以大幅提高。以下即以〈禮記部〉為例，說明在〈禮記部〉中，按、注所具有的文獻價值。

在〈禮記部〉中，第一條按、注引錄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之記載，說明《禮記》一書之撰作始於何時，第二條之按語則引錄孔穎達《禮記正義》之言，以為《禮記》一書雖出於孔氏，然直至七十二子之徒才將敘禮之義編而錄之，並摘錄討論某些篇章撰作者之問題。使吾人明白《禮記》一書之撰作時代始於何時，並對某些篇章作者的爭議稍有認識。在此同時，因為〈孔子世家〉載及年代時所用之紀年為魯國年表，因此作者於其後補充言「按：哀公六年，敬王三十一年也」。使讀者得與周代紀年相對應。

此外，在「彙考二—四」中，將自漢至明代有關《大學》之著作列出，並將其序、跋列於其後的按語中，使人在短時間內可以清楚知道此書的作意及內容大綱，且倘若有現今已佚之書者，更有賴於其序文之保存而得以了解是書的大概。然其序跋多是自朱彝尊《經義考》中錄出，有些朱書中未錄或未見之序跋，其大體未有，其補錄者有戴聖《禮記》之宋金恕序；鄭玄《月令注》之宋金恕序；魏徵《類禮》之宋金恕序；張昞釋《尊儀注》之自序；黃道周《儒行集傳》之自序。

除此之外，在《經義考》中其節文有時乃具有「互見」之功，以免重覆。如其在「彙考六—八」中，徵引《經義考》之書目，且將其後的按語、序跋、引用相關人物之談論皆全文錄出。若序跋已見前面「彙考二—四」中，則加按語言：「按序已另載，茲不重錄。」然據其按語所言查找前面之序跋，發現竟有重出之處，其重出者為：戴德《禮記》之韓元吉、鄭元祐及黃佐序；吳澄《禮記纂言》之高梯序及張萱跋、陸元輔跋；胡廣《禮記大全》之陸元輔跋。另有二篇序跋，按語雖言見於前，然查找前面所引序跋卻未曾見到，其為王氏《夏小正集解》之王氏自序；楊簡《孔子閒居解》之曾熠後序。

在按、注中，也可見編者考證之處，如在「彙考一」「中宗嗣聖年，王元感上《禮記繩愆》三十卷，乞寫藏祕書」一條，徵引《舊唐書·王元感傳》，言王元感所撰《禮記繩愆》於武后長安年時所上。在書中只言武后長安年，編者為使讀者能

<sup>10</sup> 同前註，頁 65-82。



夠與唐代紀年相應，故於按語言：「武后長安年，即中宗嗣聖年。」<sup>11</sup>

但編者之考證有時也會有錯誤之處，如在「彙考一」「高祖乾祐元年，以聶崇義為《禮記》博士」一條中，其徵引《宋史·儒林傳》之資料，言聶崇義於乾祐中累官至國子《禮記》博士。在《宋史》中未明言聶崇義於乾祐何年任《禮記》博士，故按語言：

按：乾祐止一年，故知為元年。<sup>12</sup>

由於史書未詳細明言聶崇義於乾祐何年任《禮記》博士，故編者為怕讀者不明白，便多加按語言後漢高祖乾祐止為一年。但查找後漢高祖之紀年，僅為天福一年(947)，其後改天福為乾祐，至隱帝時乾祐共有三年，故由此可知編者考證上之不完整。《宋史》卷四百三十一言聶崇義於乾祐中累官至國子《禮記》博士，校定《公羊春秋》，刊板于國學。此處未明言此乾祐何年，但由《舊五代史》中之後漢〈隱帝本紀〉中可知，乾祐元年五月，國子監以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、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四經未有印板，於是集學官考校雕造。從此條資料間接可推斷傳中所稱乾祐中為乾祐元年。

除此之外，按、注有時也會對異文稍加說明，如「彙考二」中載及孔穎達《禮記正義》之自序，文後之按語言：

此篇所引先儒姓名多有與史傳異者，如「庾蔚之」成「庾蔚」；「沈重」作「沈重宣」；「徐遵明」作「徐道明」；「熊安生」作「熊安」之類，未知傳寫訛誤，亦別有所據，姑誌於此以俟考。<sup>13</sup>

由此可知，編者考證孔氏之自序中所載人名，與後世多有不同，為表謹慎，其只羅列人名中不同之處，並未妄敢斷定孔氏之失，只言或為傳寫訛誤，或為別有所據，因此並存以考。又如其引《漢書·儒林傳》之文：「漢興，魯高堂生傳《士禮》十七篇，而魯徐生善為頌。孝文時，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，傳子至孫延、襄。襄，其姿性善為頌，不能通經；延頗能，未善也。襄亦以頌為大夫，至廣陵內史。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、桓生、單次皆為禮官大夫。而瑕丘蕭奮以《禮》至淮陽太守。諸

<sup>11</sup> 見臺灣中華書局編：《中國歷代經籍典》（臺北：臺灣中華書局，1970年），卷211，頁1041。

<sup>12</sup> 同前註，頁1041。

<sup>13</sup> 同前註，卷212，頁1044。

言《禮》為頌者，由徐氏。」於其下之按語言：「『頌』，《史記》作『容』。」<sup>14</sup>此為考證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兩者於記載上文字之不同，可資後人考證。

又如「雜錄一」中引錄《容齋續筆》卷九，談論《大戴禮記·武王踐阼篇》中所載銘文，其後之按語言：「所引諸銘與《大戴禮》少有不同，存之俟考。」<sup>15</sup>此為提醒後人可供校勘考證之用。

在〈禮記部〉之按語中，有時會解釋異名。在「藝文二」中所引之賦，篇名有不同之說者，即於其下加按語說明。如〈躬耕帝籍賦〉，其言「一作〈籍田賦〉」；〈世子齒於學賦〉，言「一作〈入學齒胄賦〉」；〈射宮賦〉，言「一作〈太學射堂賦〉」等。又恐後人不明其所錄詩賦與《禮記》何篇有關，於詩賦下皆會標明《禮記》之篇名。如〈服蒼玉賦〉標明〈月令〉；〈躬耕帝籍賦〉標明〈月令〉；〈大合樂賦〉標明〈月令〉；〈反舌無聲賦〉標明〈月令〉；〈世子齒於學賦〉標明〈文王世子〉；〈白受采賦〉標明〈禮器〉；〈松柏有心賦〉標明〈禮器〉；〈竹箭有筠賦〉標明〈禮器〉；〈人不學不知道賦〉標明〈學記〉；〈學然後知不足賦〉標明〈學記〉；〈冠賦〉標明〈玉藻〉；〈笏賦〉標明〈玉藻〉；〈珪璋特達賦〉標明〈聘義〉等。

在按語中，有時也會對所徵引的某書略加說明。如「雜錄二」中引錄《圖書編》一書，於引文之後的按語下云：

右〈讀禮記序〉。按：《圖書編》多集前人之論而不著其姓名，故附之雜錄。<sup>16</sup>

除了標示本段文字出於《圖書編·讀禮記序》外，還對《圖書編》一書的性質略加說明，並解釋編者將此段文字置於「雜錄」一類的原因。

在〈禮記部〉中，常可見其因避諱而改字的情形。如將「鄭玄」改為「鄭元」；《易統通卦驗玄圖》改作《易統通卦驗元圖》；「史玄道」改為「史元道」，此皆為避清聖祖玄燁之諱而改。又如其有時為維護清朝正統之用心，所以對文字有所刪改，如在〈大學部〉王守仁《大學古本旁釋》一卷下其雖選錄鄭曉之說，但將文中言「國朝正學方氏孝孺」一句的「國朝」二字省去，乃是因為當時正

<sup>14</sup> 同前註，卷 225，頁 1102。

<sup>15</sup> 同前註，卷 227，頁 1111。

<sup>16</sup> 同前註，卷 228，頁 1113。

統王朝已為清代，故對此二字極為敏感，因此刪削二字。又如「懷宗崇禎元年十月，御文華殿講《大學》」一條，其按注言自《春明夢餘錄》所錄，與《春明夢餘錄》原文對照，可知其省略「諸臣皆贊美，帝曰：『書有不如法處，卿等當為改正。』輔臣叩首謝」。此雖因與《大學》一條較為無關，但可由此看改經之風，惜編者將此段省去，或許乃是因其不欲使後人知曉明代帝王之語也未可。又如張岐然《古本大學說》之按語引錄黃宗羲之言，卻省去「國變後，寄跡僧寮，後四年，落髮叢林，稱為仁庵禪師。自薦方外」<sup>17</sup>之語，此乃是站在清代統治者的立場為其設想，將此「不敬」之語刪去。以上所論皆與其時代背景有密切關係，故於利用資料時應當特別注意。

### （三）可補史書之不足

前面已經提過，《古今圖書集成》大量彙集歷代資料，使得翻檢者容易迅速掌握某類文獻。除此之外，因其大量運用各種史書、類書、方志、文集，使得文獻的蒐集更形完整，可彌補歷代正史的不足之處。

除了前面所提過，其徵引其他書籍以彌補史書之不足外，更可因其彙集歷代文獻資料，使得查閱者得以對某一事件有更完整的了解。如在「彙考一」明代之資料中，引錄「神宗萬曆十八年，命經筵進講《禮記》」一事，其中先補充《明紀》之資料，知道明神宗之所以進講《禮記》一書，乃是因為讀到《貞觀政要》中的記載，其言唐太宗時，曾停講《貞觀政要》而令講《禮記》一事，於是心有所感。之後再補充《明外史》的資料，言黃鳳翔曾上奏讀《禮記》之要，後擢升為禮部右侍郎一職，可使吾人對明神宗萬曆時，進講《禮記》一事，有更完整的了解。

### （四）校勘之文獻價值

《古今圖書集成》徵引資料弘富，不僅彙編經書與史書中的資料，還包括了古代類書中的文獻，對於校對現存書籍時有很大的幫助。如「總論三」中引錄葉夢得《禮記解》之資料，其中於〈經解篇〉下某段文字言：

五者，坊民之具，雖更百世非為舊也。要其文質不同，則帝王有不相沿襲

<sup>17</sup> 見〔清〕朱彝尊原作，汪嘉玲等點校：《點校補正經義考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，2004年），卷161，頁343。

者，亦以趨時也。<sup>18</sup>

但在葉夢得的《禮記解》中卻作：

五者，天下之大經，傳百世而為舊也。要其文質不同，則帝王有不相沿襲者，所以為異也。<sup>19</sup>

兩段文字有著明顯差異，不知是否為《古今圖書集成》編者別有所據，亦或為何，總之此足可供今人考證兩個版本間的差異。

在「彙考」中同時羅列各種書志，可使吾人比較各種書目於著錄時是否有所出入。如皇侃之《禮記義疏》一書，在《隋志》中載「《禮記義疏》九十九卷，《禮記講疏》四十八卷」。《唐志》中載「《禮記講疏》一百卷，又《義疏》五十卷」。《經典釋文》載「《禮記義疏》五十卷」。《通志》載「《禮記義疏》九十九卷，《禮記講疏》四十八卷」。各個書志間的記載略有差異，可使翻檢者於短時間中經由彙集之資料一目了然，進行比較。

又如在《古今圖書集成》中所徵引之書志，與現在所見之同一書中，著錄某書之書名、撰者、卷數或有所差異。如《古今圖書集成》引《經典釋文》云：「業遵《注》二十卷。」現可見《經典釋文》作「十二卷」；徵引《續文獻通考》云：「《月令解》十二篇。張慮著。慮，慈谿人。仕於理宗朝。嘗謂〈月令〉雖出於呂不韋，而王者後天以奉天時，此書不可缺，乃為《月令解》二十篇以進。」由今存之《續文獻通考》可知，其後「《月令解》二十篇」，應作十二篇；徵引《國史經籍志》言：「《禮記含文》三卷。」今《國史經籍志》則作「《禮緯含文嘉》三卷」；徵引《經義考》言：「戴聖《禮記》。《通志》二十卷。」今本《經義考》則作「戴聖《禮記》。《隋志》二十卷」；徵引《經義考》言：「何修之《禮記義》。」今本《經義考》則作「何侗之《禮記義》」。以上只是略舉數例說明，在〈禮記部〉中還有許多與現今所見書目不同之處，皆足可供文字之校勘。

又如在〈禮記部〉中，許多徵引資料與今所見之文獻有些許差異，如前面已提過的葉夢得《禮記解》中之文字。除了較大篇幅之差異外，許多小地方之徵引也略有不同，同樣可以提供校勘文字之功。如「雜錄一」中徵引《顏氏家訓》之資料云：

<sup>18</sup> 《中國歷代經籍典》，卷 221，頁 1087。

<sup>19</sup> 見〔宋〕葉夢得撰：《禮記解》，收入《叢書集成續編·經部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94年），第9冊，卷3，頁213。

〈月令〉：「荔挺出。」鄭元注云：「荔挺，馬薤也。」《說文》云：「荔，似蒲而小，根可爲刷。」《廣雅》云：「馬薤，荔也。」《通俗文》亦云馬薤。《易統通卦驗元圖》云：「荔挺不出，則國多火災。」蔡邕《月令章句》云：「荔似挺。」高誘注《呂氏春秋》云：「荔草挺出也。」然則《月令注》荔挺爲草名，誤矣。河北平澤率生之。江東頗有此物，人或種於階庭，但呼爲草蒲，故不識馬薤。講《禮》者乃以爲馬薤。堪食，亦名豚耳，俗曰馬齒。江陵嘗有一僧，面形上廣下狹。劉緩幼子名譽，年始數歲，俊悟善體物，見此僧云：「面似馬薤。」其伯劉縉因呼爲荔挺法師。縉親講《禮》名儒，尚誤如此。<sup>20</sup>

在今本之《顏氏家訓·書證》中言：

〈月令〉：「荔挺出。」鄭玄注云：「荔挺，馬薤也。」《說文》云：「荔，似蒲而小，根可爲刷。」《廣雅》云：「馬薤，荔也。」《通俗文》亦云馬薤。《易統通卦驗玄圖》云：「荔挺不出，則國多火災。」蔡邕《月令章句》云：「荔似挺。」高誘注《呂氏春秋》云：「荔草挺出也。」然則《月令注》荔挺爲草名，誤矣。河北平澤率生之。江東頗有此物，人或種於階庭，但呼爲早蒲，故不識馬薤。講《禮》者乃以爲馬薤。馬薤堪食，亦名豚耳，俗曰馬齒。江陵嘗有一僧，面形上廣下狹。劉緩幼子民譽，年始數歲，俊晤善體物，見此僧云：「面似馬薤。」其伯父縉因呼爲荔挺法師。縉親講《禮》名儒，尚誤如此。<sup>21</sup>

除了因避諱而將「玄」字改爲「元」外，文字上有幾處也略有差異，如「堪食」作「馬薤堪食」；「草蒲」作「早蒲」；「名譽」作「民譽」；「俊悟善體物」作「俊晤善體物」；「其伯劉縉因呼爲荔挺法師」作「其伯父縉因呼爲荔挺法師」。此數處之不同皆可提供與今本不同的文字考證之用。

除此之外，《古今圖書集成》在一部分按、注裏對版本有所反映，雖在〈禮記部〉一類中未見，但在其他部的按、注卻可見。如《樂律典·總部》「彙考五」中引錄了曹操的〈對酒·短歌行〉，其非通引全詩，故在按、注中說明：「此詞尚有『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，繞樹三匝，何枝可依』四句。今照《宋書》不錄。」此可

<sup>20</sup> 《中國歷代經籍典》，卷 227，頁 1111。

<sup>21</sup> 見張靄堂譯注：《顏之推全集譯注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04 年），頁 215-216。

知《集成》所引錄者為《宋書》之版本。又如《禽蟲典·總部》「彙考」引錄《大戴禮記》之文字，對「升主狗」加注說明：「升別作斗。按：此篇古本文多錯誤，姑仍其舊。」由此皆可知《古今圖書集成》可供校勘之文獻價值。

### （五）提示研究之方向

《古今圖書集成》因為彙集歷代文獻資料，故於短時間內，使吾人於研究時容易掌握某一事類的資料。也因此，在查檢之中也因見到歷代資料的彙集，進而提供研究的方向。如其所徵引明代王圻《續文獻通考》一書，與今可見於清高宗時敕撰重刻的《續文獻通考》有著明顯的差異。清高宗時，除敕武英殿校刊三通統一版本外，復命儒臣踵事增華，依樣撰述《續通典》、《續通志》、《續文獻通考》三書，除增補前書所缺之唐末五代之紀傳典章外，此續三通專記宋、遼、金、元、明五朝之事，故間或有稱之為《五朝通典》、《五朝通志》、《五朝通考》，各書所述均及明代而止。由此可知，《古今圖書集成》所錄之《續文獻通考》當為明代刻本之《續文獻通考》，不可能為清高宗時重編之《續文獻通考》。倘若核對明萬曆三十一年曹時聘等所刻的《續文獻通考》，即可發現與《古今圖書集成》所徵引的版本大體相同，不似與清高宗時重刻的《續文獻通考》有著較大的差異。以張處《月令解》之著錄為例，清高宗時重刻的《續文獻通考》於其下著錄為：

處，字子宓，慈谿人。慶元進士，官至國子監祭酒。諡「文靖」。<sup>22</sup>

萬曆本之《續文獻通考》則作：

處，慈溪人。仕于理宗朝。嘗謂〈月令〉雖出於呂不韋，而王者後天以奉天時，此書不可缺，乃為《月令解》十二篇以進。<sup>23</sup>

由此可知兩者明顯的差異。正因為《古今圖書集成》中徵引了王圻《續文獻通考》的資料，才使吾人於覆檢原文時發現兩者重大之差異性，間接提示了未來研究方向，使吾人能對清高宗時重刻的《續文獻通考》版本，與萬曆時《續文獻通考》的版本進行進一步的比對研究。由兩者間之比對可以得知，清高宗時所重編之《續文獻通考》已與王圻所撰《續文獻通考》不同，或可視為另一著作。

<sup>22</sup> 見清高宗敕撰：《續文獻通考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7年），第2冊，卷152，頁4103。

<sup>23</sup> 見〔明〕王圻撰：《續文獻通考》，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·子部》（臺南：莊嚴文化事業公司，1995年），第188冊，卷174，頁342。



又〈禮記部〉於徵引《經義考》之資料時，會對某些人名進行刪削的工作。如黃虞稷之名有時全部刪去，有時則又作黃氏；錢謙益之名有時省略為錢氏，有時又不加省略；汪霽、蔣一葵、陸隴其之名全部刪去；汪楫省略為汪氏；王廷相省略為王氏；汪琬省略為汪氏；杜濬之說則全部刪去。由這些人名之刪去及省略中，可以發現編者之疏失。如有時黃虞稷之名會遭刪去，有時卻又存留黃氏，但在〈大學部〉中，其名卻全部保存，未曾刪削，其因究竟為何，值得進一步加以討論。至於某些人名之省去，則與時代因素有關，如錢謙益乃是至乾隆時期方遭忌諱，康熙時編定《古今圖書集成》時尚未有嚴重之忌憚，因此於〈禮記部〉中仍可見錢氏之名。至於其他遭刪削人名的用意，皆可供後人進一步加以討論。又如陸隴其，為康熙九年(1670)進士，歷任江南嘉定縣及直隸靈壽縣知縣、四川道監察御史等職。何以陸氏為增刪削其名呢？或許乃是因為他任御史後評駭朝廷捐納舉官的弊政，為朝臣們所忌，遭到打擊，被迫辭官還鄉，旋即於次年康熙三十二年(1692)病逝。其生前雖然仕宦不顯，但到了雍正二年(1724)，清廷使其陪祀於孔廟之中。乾隆元年(1736)，又賜謚清獻，加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；二年再御賜祭文；三年復御製碑文。《古今圖書集成》之編定為康熙年間，故當時陸隴其之名或為當權者所忌，因此有關其名才遭刪削。

如前所提到者，其於按、注中也提到許多與今本文字略有不同之處，此皆可供後人加以考證利用，也揭示了《古今圖書集成》更多的文獻價值。

#### 四、文獻之缺失

《古今圖書集成》所提供在文獻資料方面的價值，除有上述所論各點，然在文獻的選錄上也有其缺失及不足之處，以下即略分數點加以說明，以使吾人於利用時能加以注意。

##### (一) 徵引資料不明

類書作為一種輯錄性質，且提供學子檢索利用的文獻，其詳細注明引文出處則相對變得十分重要。因為讀者在見到類書所錄之資料後，勢必要翻檢原文出處，此時倘若類書中未詳細注明引文出處，則造成讀者們於覆查原文時的困難，古代許多類書中即有此項缺點。因為類書是輯錄文獻資料，故有時為節省篇幅或以為其不影

響引文大意，則對原文獻加以刪削修改，也因而使得利用者在使用時，必須查核原文出處，否則就容易有出處錯誤的情況出現。

《古今圖書集成》雖然對引文出處大多加以注明，但是仍然有不明之處，使得讀者於覆查原文時造成一定的困難。如其在〈禮記部〉引用《玉海》一書，只標明出自《玉海》，但《玉海》一書有二百卷，究竟錄自何卷何類，《古今圖書集成》並未說明，造成讀者於查檢時的不便。如其徵引《玉海》「景德四年九月庚午，宴近臣于龍圖閣之崇和殿，翰林學士邢昺視壁間掛《尚書》、《禮記圖指》、《中庸》，九經事講述，其義皆有倫理，在位聳聽」<sup>24</sup>。一事，卻未明言出自《玉海》何卷。經由翻檢《玉海》之後發現，其乃徵引自《玉海》卷三十之文。又如「雜錄一」中徵引《顏氏家訓》：「《禮·王制》云：『羸股肱。』鄭注云：『謂擗衣出其臂脛。』今書皆作擗甲之『擗』。國子博士元該云：『擗當作擗，音宣，擗是穿著之名，非出臂之義。』案《字林》，蕭讀是，徐爰音患，非也。」<sup>25</sup>書中只注明出自《顏氏家訓》，但卻未標明出自何篇，經由查檢後才知出於《顏氏家訓·書證篇》中之文。

由以上兩例皆可見到《古今圖書集成》於徵引資料之注文中交代不清，使讀者於覆查原文時倍覺困難。更遑論有時於徵引資料出處時，書名、篇名不一致，或有不明確的情況，更甚有錯誤之處。如在〈禮記部〉「總論三」中徵引鄭樵《六經奧論》一書，但在其他部卻未不同之著錄。〈易經部〉中作「鄭樵《奧論》」；〈書經部〉中作「鄭樵《辨偽》」；〈詩經部〉作「鄭樵《詩辯妄》」；〈春秋部〉作「鄭樵《春秋傳》」；〈周禮部〉作「鄭樵《周禮辨》」；〈三禮部〉作「鄭樵《六經奧論》」。由於編者著錄時未統一之故，易造成查檢者之誤會，此為其極大之缺失。

除此之外，其於著錄徵引之書籍時也有錯誤，如其言王應麟《漢書藝文志考證》，實應為《漢藝文志考證》；韓邦奇《語錄》，應為《苑落集·見聞考隨錄》中論《禮記》之篇章；東萊呂氏《禮論》應為《呂東萊先生文集·禮記說》；石林葉氏《禮說》應為葉夢得《禮記解》之文。此皆為著錄上之失，查閱者於利用時應特別注意，以免產生誤解。

<sup>24</sup> 《中國歷代經籍典》，卷 211，頁 1042。

<sup>25</sup> 同前註，卷 227，頁 1111。

《古今圖書集成》於「彙考」中所引錄的序跋，大多是出於朱彝尊《經義考》中所錄之序跋，但是編者卻未提隻字片語，除有掠人之美外，且易造成讀者於覆檢時的不便，不知其序跋究竟引錄自何處。

## （二）錄文之未完備

《古今圖書集成》是書的性質因為是類書，所以其輯錄的文獻資料，有時皆作一定的刪節修改，關於此點，讀者於利用時自當明白。但是頗為缺憾者，乃是《古今圖書集成》倘若於節錄時加注說明，則可使讀者於利用時能夠稍加注意。如在「紀事一」中徵引《三國志·鍾會傳》注解之資料言：「其母《傳》曰：『夫人性矜嚴，明於教訓，會雖童稚，覲見規誨。年十三，誦《周禮》、《禮記》。』」<sup>26</sup>然翻檢《三國志》之記載可知，其應為：

會時遭所生母喪。其母傳曰：「夫人性矜嚴，明於教訓，會雖童稚，勤見規誨。年四歲授《孝經》，七歲誦《論語》，八歲誦《詩》，十歲誦《尚書》，十一誦《易》，十二誦《春秋左氏傳》、《國語》，十三誦《周禮》、《禮記》，十四誦成侯《易記》，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。」<sup>27</sup>

可知其省略中間一大段文字，但卻未曾標明，雖說類書於徵引資料時常會省略文字，但也因此造成利用者之不便。且其於徵引時只引錄某段文字，全然不顧及文意之適當與否，極可能造成利用者閱讀時之困難或誤解。

又如徵引《周書·熊安生傳》之資料言：

熊安生，字植之。東魏天平中受《禮》於李寶鼎。所撰《禮記義疏》四十卷行於世。<sup>28</sup>

然翻檢《周書》之原文可知，其應為：

熊安生，字植之，長樂阜城人也。少好學，勵精不倦。初從陳達受《三傳》，又從房虬受《周禮》，並通大義。後事徐遵明，服膺歷年。東魏天平中，受《禮》於李寶鼎。遂博通《五經》。然專以《三禮》教授。弟子自遠方至者，千餘人。乃討論圖緯，摭摭異聞，先儒所未悟者，皆發明之。齊河

<sup>26</sup> 同前註，卷 225，頁 1103。

<sup>27</sup> 見〔晉〕陳壽撰，〔宋〕裴松之注：《三國志》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78 年），卷 28，頁 785。

<sup>28</sup> 《中國歷代經籍典》，卷 225，頁 1105。

清中，陽休之特奏為國子博士。……安生既學為儒宗，當時受其業擅名於後者，有馬榮伯、張黑奴、竇士榮、孔籠、劉焯、劉炫等，皆其門人焉。所撰《周禮義疏》二十卷、《禮記義疏》四十卷、《孝經義疏》一卷，並行於世。<sup>29</sup>

此段文字頗長，故《古今圖書集成》編者予以省略。然而因為其只摘取某部分，使得熊安生完整的向學經過及其間的經歷無法自引文中了解，且只列熊安生撰《禮記義疏》一書，易使人誤會熊氏只有此本著作。

又其有時會任意割裂原文，使得徵引之文獻與原書有極大差異，此為編者最大之疏失。其徵引呂祖謙《呂東萊先生文集·禮記說》一書，但是摘錄之文與原書有相當大之差異。如其言：

下氣怡色柔聲，此六字，非特事父母當然，凡處已待人，能體此六字，則見孔子鄉黨氣象。起敬起孝，蓋我孝敬之心無間斷。隨遇隨起，故雖父母不從吾諫，至於怒，至於撻之流血，而起敬起孝，常自若。非起止之起，只是遇捺不住。<sup>30</sup>

在《文集》中則是拼合前後兩段，兩段間間隔數段，且毫不相干，其一作：

下氣怡色柔聲，此六字，非特事父母當然，凡處已待人，能體此六字，則見孔子鄉黨氣象。

另一則作：

起敬起孝，蓋我孝敬之心無間斷。隨遇隨起，故雖父母不從吾諫，至怒，怒至於撻之流血，亦起敬起孝，常自若也。起非起止之起，只是遇捺不住。<sup>31</sup>

由此可知其拼湊其後兩段不同文意之跡，此也易造成查閱者於閱讀資料時產生誤解，以為此兩段本為相聯文句，產生理解困難。

又如有時編者為求與《禮記》篇章順序相符，因此任意改動原文之順序。如徵引《圖書編》一書時，將「月令辨」一節移至「王制」之後，以求符合《禮記》篇目之順序，然在《圖書編》原書中卻非如此，實為一大缺失。

以上皆為《古今圖書集成》編者於錄文時的不完備情形，但因《古今圖書集

<sup>29</sup> 見〔唐〕令狐德棻等撰：《周書》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78年），卷45，頁812-813。

<sup>30</sup> 《中國歷代經籍典》，卷221，頁1085。

<sup>31</sup> 見〔宋〕呂祖謙撰：《呂東萊文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），卷16，頁378。

成》本為類書性質，故其錄文時為避免重覆及繁重，自當有所省略，讀者於利用時只要稍加明白類書的體例，於利用時核檢原書，自不當身受其害。

### （三）所收資料未全

《古今圖書集成》雖為現存最大套的類書，且其雖號稱為「古今圖書集成」，但實則並非如此。《古今圖書集成》於開始編纂時所利用的文獻資料，只是陳夢雷的個人藏書，書稿內容的下限亦止於明代，後來允祉頒發了協一堂的圖書，書稿內容的收錄範圍才延至清代，合計約一萬五千餘卷<sup>32</sup>。但其對清代圖書的收錄仍不全面，康熙雖批准《古今圖書集成》的開館編纂，但卻未像乾隆對《四庫全書》的態度一般，下旨為其廣蒐圖書，故其立館後所補充者主要是康熙年間的官編圖書及大量地方志。清代個人的詩文作品少為採錄，個人的著作書目也極少錄進或利用，由此可知其對清代文獻資料蒐集的不完備性。

又如「彙考一」中彙編關於歷代《禮記》相關之記載，然何以有些朝代著錄詳細，有些朝代之記載卻特為疏略？以明代為例，當時編定《禮記集說大全》一書應頗為重要，然在明代一朝的「彙考」中，卻只有明太祖及明神宗兩條資料，與唐宋時代之著錄資料相較，顯得頗為缺漏不足。

又如其徵引之書籍中，有許多部分也提及關於《禮記》之相關記載，何以編者於摘錄時不加引用？如其引用韓邦奇《苑落集》中五條資料，仍在其同卷中卻有更多論及《禮記》之相關條目，如論祭祀用尸之義、祭祀時之饋食禮等<sup>33</sup>。其徵引《容齋續筆》中兩條資料，然在《容齋續筆》中卻有更多條論及《禮》之條目，忌諱諱惡、豕宰治內兩條，分別論及《禮記》〈王制篇〉及〈內則篇〉<sup>34</sup>。從其中可以發現編者摘引資料之未全，且同一書之去取標準也不清楚，不知究竟何類資料加以引錄，何類資料又有所淘汰。

以〈禮記部〉為例，其「彙考一」中所收錄的資料僅止於明神宗萬曆十八年，其後的資料並未見輯錄；且於〈禮記部〉的輯錄資料中，未見有關清代人的文集作

<sup>32</sup> 參照自陳夢雷：《松鶴山房文集·進彙編啟》，頁38。

<sup>33</sup> 參照〔明〕韓邦奇撰：《苑落集》卷18，收入《西北文學文獻》（蘭州：蘭州古籍書店，1990年），卷3，頁310。

<sup>34</sup> 見〔宋〕洪邁撰，孔凡禮點校：《容齋隨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5年），上冊，卷14，頁390、395。

品，此為《古今圖書集成》收錄資料的缺失。

#### （四）其他缺憾之處

除了以上各點之缺漏外，《古今圖書集成》尚有不足的缺憾之處。如類書通常為節省篇幅，於是對於相同文字之處盡量避免重覆出現，但在《古今圖書集成》中重覆現象卻相當多，有長短交錯重覆者，更有完全重覆者。如元人虞集的傳記材料，主要引錄了《元史》裏的本傳，但不僅〈官常典〉、〈氏族典〉、〈經籍典〉、〈文學典〉、〈字學典〉之間重覆引錄，〈經籍典〉內的〈經學部〉、〈易經部〉、〈春秋部〉、〈論語部〉、〈孟子部〉、〈國語部〉、〈集部〉、〈類書部〉的材料也有重覆。

在〈禮記部〉中也可見到重覆徵引之資料，如按其分類標準，自當將《中庸》、《大學》一類的書目載於〈中庸部〉與〈大學部〉中，但在「彙考五-八」中，仍可見關於《中庸》和《大學》的相關書目。可知編者於抄錄時的疏失，未將此二類書目刪去。且〈禮記部〉中所重覆載此二類之書目，於〈大學部〉、〈中庸部〉、〈三禮總〉論部、〈經學部〉中皆可見到，資料重覆相當嚴重，為編者一大疏失。

又如編者有時會妄加改動文字，如其徵引葉夢得《禮記解》中「《周禮》以嘉禮親萬民」一條，原書作《周官》，而非《周禮》。編者或許是怕後人不明白《周官》為何書而改，但也因此失去原書之貌，頗為可惜。

### 五、結語

《古今圖書集成》為現今所存最大的一部類書，但研究其文獻價值者卻幾乎沒有，可見受人忽略之重。《古今圖書集成》輯錄各門各類的文獻資料，按照一定的方法編排，進而便於人們檢索利用，此為其最大功用，但也因此而產生的文獻價值，實不可不注意。

本書的緯目編排細密，主要的目的乃是為了「既要盡可能收錄文獻的齊全，又不是一律看待，而是兼顧兩個方面，以使所編之書保有最充分的檢索徵引功能」<sup>35</sup>。

<sup>35</sup> 見裴芹著：〈談《古今圖書集成》的結構體例〉，《古今圖書集成研究》，頁 55。



就因《古今圖書集成》最初編纂的目的是為了提供學子檢索方便之用，故在體例上自當有嚴謹的規劃，才容易使人查檢便利，也因此其緯目的分類編排，足以見其此方面的用心。

關於《古今圖書集成》所具備的文獻價值，大致可分為：文獻資料之彙集、按、注之文獻價值、可補史書之不足、校勘之文獻價值、提示研究之方向等六大點價值。在文獻資料彙集上，其可使讀者在短時間之內快速掌握某類資料之文獻。在按、注之價值方面，提供許多編者欲提醒查閱者注意之處，如紀年、文字異同等。在補史書不足方面，徵引其他書籍以彌補史書之不足外，更可因其彙集歷代文獻資料，使得查閱者得以對某一事件有更完整的了解。在校勘之價值上，其可與現存書籍文字互相校勘。在提示研究方面，可提示吾人在研究上的新方向。以上各點皆為《古今圖書集成》在文獻上所具有的價值功能。

此外，《古今圖書集成》仍然有其缺失之處，其可分為：徵引資料不明、錄文之未完備、所收資料未全、有所缺憾之處等四點。但此仍不可掩飾《古今圖書集成》在文獻資料利用上的價值。